

# 略论中国外交观念的演进

——基于话语分析视角

陈以定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任何外交都离不开话语实践,就如任何意识形态离不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一样。60 多年来,中国外交从和平话语到革命话语再到和平与发展话语、合作话语的变迁,真实记载着中国外交不断成长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外交中的和平观念、革命观念、发展观念与和谐观念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辩护功能。

[关键词]中国外交;观念;话语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2)01-0039-06

话语(Discourse)是指在某种特定语境中所使用的语言。<sup>[1](p532)</sup>它可以是书写或口头表达的特定概念,也可以是能够表达完整意义的词语、词组、句子和文章。外交话语,就是外交实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表达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它主要存在于国家的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国家间的条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之中。<sup>[2](p114)</sup>从福柯的话语观来看,<sup>①</sup>外交话语不仅关涉外交中的书写语言和口头语言的“文本”向度,而且涉及用来建构外交知识领域和外交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折射出国家外交背后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sup>[3](p81)</sup>所以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观念、思想、价值)与外交话语密切相关,外交话语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外壳”,意识形态内嵌于外交话语之中并赋予其合法性与正当性。

中国不同时期的外交话语,不仅反映了中国外交实践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中国外交思想的“观念进程”,表征了中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外交观念是社会主义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交思想,它来源于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实践,受到马列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深刻影响,并被中国国内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打上深深印记。在此,笔者根据中国外交政策话语在不同历史时期“话语秩序”的变化,大致把新中国外交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20 世纪 60 年代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前 20 年和 21 世纪以来,以此分析中国外交观念的演进历程。

一、以和平话语为主要表述特点的中国外交观念(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

1949 年新中国建立,是当代世界和中国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不仅第一次实现了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国家主权的实质独立与有力保障,而且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两大阵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外交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问题,毛泽东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形象语言,表达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抉

[收稿日期]2011-09-0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维度的意识形态研究”(09BKS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以定(1978-),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讲师,本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

择,即作为一个新型的国家,抛弃旧中国的外交传统,建立新中国独立、自主、平等的对外关系,团结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民族主义国家和各国民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sup>[4](p10)</sup>所以,“独立自主”、“建立外交关系”、“保障国家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运动”、“拥护世界持久和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话语,便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一般话语。

根据对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1956年)和《国务院政府报告》(1954年,1957年,1959年)5份重要政治文件(外交部分)的考察,“和平”话语更具有主导性、原则性和经常性,这在中国对国际和平形势的判断、和平外交政策的规定与和平议题的确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同时在上述五份政治文件中,“和平”概念,出现的次数分别为5次、39次、44次、15次、36次,要比“侵略”(2、14、16、8、22)、“战争”(1、7、14、3、11)、“革命”(0、2、0、0、0)、“发展”(1、19、9、3、21)、“主权”(2、2、5、3、0)等其他重要概念频繁许多,并形成诸如“和平共处”、“和平建设”、“和平竞赛”、“和平环境”等多种表述方式,体现了新中国和平融入国际体系的迫切愿望与和平开展国内建设的现实要求。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中的和平话语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新社会国际和平思想的基础上,将之运用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中,并在外交实践中与西方主权国际关系体系、殖民体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联系起来,形成中国的和平外交观念,“和平为上”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这一外交观念的集中体现。

在和平外交观念下,中国外交的两大任务,即“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友谊”和“反对帝国主义”,<sup>[5](pp1-2)</sup>也拥有特定的价值内涵。第一,“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友谊”。中国与苏联结盟、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固然有意识形态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考量,

但在中国外交话语实践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和平堡垒”的特定指代,中国“一边倒”方针蕴涵有维护世界和平的价值诉求。第二,“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就是侵略,“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一个基本思想,但这个时期“反帝”在中国外交话语中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表述方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帝”既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垄断资本主义,也不是在具体对象上反对美国(美帝国主义),“反帝”的核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侵略是“反帝”的价值内涵。

由此可见,以“一边倒”和“反帝”为主要外交任务的和平话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28年革命历史经验的积淀和改变近代100多年屈辱外交的决心,是中国独立意识与主权意识的自觉表达,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诉求。在此,和平话语一方面建构中国外交的属性,另一方面中国外交的话语实践推动和平外交观念的形成,并由此建构中国外交的外貌与内涵,和平话语与中国外交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效应,中共主张的意识形态和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实现了高度的统一。<sup>[6](p1)</sup>1949到1955年,新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建交高潮,共有22个国家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新生的红色政权第一次获得了世界范围的承认。<sup>[7](p46)</sup>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主张,通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和其他国际场合得到广泛传播,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也在朝鲜战争、台海危机和印支战争中得到充分体现。

## 二、以推动世界革命为主要话语内容的中国外交观念(20世纪60年代到改革开放)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受到历史边界纠纷与现实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与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苏两国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成为对峙的双方。随着中苏关系的演变和国际格局的动荡、分化与改组,中国外交政策与外交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重大的变化,建国初期温和的和平外交观念逐步让位于“左”倾极端的革命外交观念,“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和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而奋斗的“革命理想主义”开始成为中国革命外交观念的主要内核。1968年林彪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一文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中国外交工作要做下层,要放在驻在国人民群众方面,不要与各国修正主义当权派、反动派当权派搞在一起”;公开提倡“造反外交”,搞“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sup>[8](P191)</sup>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成了宣传毛泽东思想。

在革命外交观念下,中国外交话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帝、修、反)”、“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称霸”、“反霸”等成了中国外交的“流行语”。而“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美苏两霸”、“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则被称为当时时代与国际格局的象征。“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成为指导中国外交思维的辩证法。

从这些外交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中国外交存在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考量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出发点、支撑点和落脚点。中国以一种“世界革命者”对抗“世界统治者”的姿态,进行“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结果导致中外关系中斗争超过妥协,冲突大于合作,对立多于对话。在此,中国革命外交观念不断强化着极“左”外交话语的表达,极“左”外交话语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好斗”形象逐渐被固定化、扭曲化和妖魔化,从而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国家安全受到多方面的严重威胁,同时也制约了中国外交的发展,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也实现正常化,中国革命外交观念开始增多“集中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考量,但强烈的政治敌意和意识形态障碍使得这一进程非常的缓慢。在中国外交话语中,联合国仍然是“美帝苏修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反对美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从总体上看,此时中国外交应当说既有保家卫国、维护主权和自我生存的重大考虑,也有革命性政治意

识形态输出和对国际形势总体严峻判断促成的实际行动,<sup>[9](P3)</sup>体现了国家利益考量和意识形态认知对中国外交的混合影响。但在观念上,中国外交仍然是革命型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和“三个世界”划分思想,还是按照意识形态标准高于一切、敌友关系泾渭分明的思维形式和行动模式,来区别国际政治力量和进行国别外交。

直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意识形态与中国外交的关系?自从民族国家体系确立后,一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从其内涵上说既包括国家基本的经济、安全利益,也包括体现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利益,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一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一国外交必然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感召力,是这个国家外交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和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但在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外交观念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一方面,中国革命外交观念没有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二战后出现的革命,基本是以实现国家独立为目标的反帝反殖民族革命,除少数国家外,大都不具有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性质。所以,当中国外交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旗帜”的时候,中国遭到包括民族主义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的抵制。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利益的过分追求压缩了中国对其他国家利益的维护。意识形态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且影响一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意识形态的维护与传播是每个国家外交追求的一个目标。但这个时期中国在处理如何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开展国内和平建设与支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经常凌驾于爱国主义之上,以牺牲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追求“推动世界革命斗争”,结果造成对中国整体国家利益的损害。

三、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话语的中国外交观念(改革开放前2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的基

本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中国内政转型一样,中国外交也开始转型,中国首先对以战争与和平为中心的国际形势有了重新认识,对时代特点作出新的判断,以“和平与发展”取代之前的“战争与革命”。这样,象征中国外交转型的话语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时期使用的一些重要外交话语,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被抛弃与重构。一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取代了“革命外交路线”。“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反对霸权主义,坚持“不结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扛旗”,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当头”,同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概念,经过“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过渡,最后被“爱国主义”取代。1981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新中国的重要外交历史经验来继承,但到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就提出“革命不能输出”,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思想。从十三大起“国际主义”不再被正式提起,“爱国主义”提法被延续下来。<sup>[10](p263)</sup>三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帝、修、反)”、“社会帝国主义”等话语,经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这一过渡提法,最后统一被“霸权主义”代替。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sup>[11](p162)</sup>在中国外交话语中,“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特指“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它不指代哪种类型的国家,与“社会帝国主义”是“苏联”代名词不同,它也不具体特指哪个国家,它的核心指代是“行为”,而非“行为体”。

伴随革命外交话语的消失,以“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为主要导向的外交话语,如“和平与发展”、“东西南北关系”、反对“军备竞赛”、主张“核裁军”“核不扩散”、支持建立“无核区”与“和平区”、支持“世界和平运动”、“不结盟”、推动“南北对话”、发展“南南合作”、推动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外交的“流行语”,显现当时中国外交工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的重大任务,预示着中国开始建构一套全新的外交“话语秩序”。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外交“话语秩序”演变中,可以窥见中国外交从观念到运行的运行轨迹,外交观念逐步转化为中国外交实践:中国从“自卫还击”惩罚越南在边境的武装挑衅到终止对缅甸共产党的援助,从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席位到向“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提出恢复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从国际多边外交活动的开展到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确定,中国开始走一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道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外交话语在延续改革开放前 10 年“话语秩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话语”。诸如“苏东剧变”、“单极世界”、“多极化”、“一超多强”、“大国关系”、“伙伴关系”等成了反映国际格局变动的热门话语。而“世界贸易组织”、“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则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象征。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话语相适应,“新安全观”、“世界多样性”、“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逐渐成为反映中国外交思想变化的“流行语”。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前 20 年,是和平话语与发展话语逐渐流行的 20 年,“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外交使用频率最高的话语。在这 20 年间,中国确立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发展型外交观念,“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成为这一外交观念的经典表述。在发展型外交观念下,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但是,中国“去意识形态化”外交并不代表国际关系中“无意识形态化”,国际政治的现实经常是大国或强国以意识形态问题(如人权、人道主义等)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社会制度问题谈的较少,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sup>[12](p61)</sup>例如,西方国家就常常认为冷战是以西方的胜利而结束,在后冷战时代,要在全世界推进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治理方

式,美国甚至提出要“使这个世界以美国的价值观念为基础”;“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建立一个国际新体系”。<sup>[13](P273)</sup>因此,在“去意识形态化”形式下如何防范、抵制和应对外部意识形态的侵入和控制,即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当然,对于一个“硬实力”和“软实力”快速增长的大国来说,如何提出、发展、维护与传播一种先进的、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并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外交意识形态,则是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以合作话语为主要发展趋势的中国外交观念(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快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达致新的高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迅速成长的大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需求和压力急剧上升,中国的国力及其快速增长的海外利益同既有的国际体系、格局和秩序之间,正经历着复杂的磨合与相互适应。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世界”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树立了新的人本观、和谐观和发展观。在外交领域,与内政的发展相适应,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观念、新话语。一是确立“外交为民”方针,强调外交要“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在外交关系中,重视发展“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二是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五个方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基本内容,从而形成了中国外交新秩序观、新文明观、新安全观和新环境观。三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市场”<sup>[14]</sup>。四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必须树立平等、合作、共赢的理念”。<sup>[15]</sup>由此可见,我国国内治理理念与外交理念之间存在着相关的思维统一性和话语相似性,体现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以共同的利益诉求构筑共享的价值,成为21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向。<sup>[16](P75)</sup>新时期在中国主要外交思想与政策话语,多以“共(同)”字、“互(相)”字、“合(作)”字为表达方式,如“合作”、“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等,在中共十七大报告外交部分(1561个汉字)共出现51次。这种合作性外交话语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与世界相联系、共命运的认知,内化为中国“共同分享机遇、共同应对挑战”的“知识领域”与双边、多边外交实践。

在以合作话语为主要趋势的外交观念下,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是:“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第一,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同周边国家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以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即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开展政治安全合作与经贸合作的典范。第二,按照“扩大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的方法,与主要大国开展双边战略协作与对话,以建立稳定的大国伙伴关系。除了与大国发展双边伙伴关系外,以“G20峰会”与“G8+5对话会议”为主要平台开展大国多边对话与合作,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大亮点。第三,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以维护共同利益。“立足点”一直是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关系的形象话语表达,“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是21世纪中国积极探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对话的新方式。第四,积极参与各种多边国际合作,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中,“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是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和“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的主要领域,如朝鲜核试验、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全球金融改革与危机应对、联合国维和与改革(重点是安理会改革)等。

由此可见,21世纪以来,合作话语日渐成为中国外交话语的主流。党的外交思想和观念通过合作话语内化为中国的外交知识和外交实践,形成了以“强调共同利益”为主旨的和谐外交观念。和谐外交观念,又以“和平发展道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和谐世界”等话语,在国际社会得

到传播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中国外交也由此进入一个新境界、新高度。当前中国外交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和谐外交观念下的外交话语优势转化为中国国际话语权优势?话语看似纯粹的思想表达形式,其实是经过选择和包装的历史内容;不同的话语,展示了不同的世界面貌,而“流行话语”则往往潜藏着话语霸权。<sup>[17]</sup>(P45)在 21 世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美国仍将是国际“流行话语”体系的主导者,从“人权外交”到“人道主义干预”、从“9·11 事件”到“反恐战争”、从“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到“普世价值”的推广,无不体现着美国的“话语霸权”。与美国霸权话语相比,中国合作话语,要更具有和平性、平等性和公正性,理应更具有话语权的竞争优势。但与此相反,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却处于劣势地位,话语权相对微弱,这从世界上流行的各式各样“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中国嚣张论”中可见一斑。因此,如何把中国外交话语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从而提升中国外交的国际话语权,是 21 世纪中国外交的一个崭新课题。

### 五、小结

任何外交都离不开话语实践,就如任何意识形态离不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一样。60 多年来,中国外交话语既客观地记载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史进程,也真实展现着中国外交观念的总体发展与演进历程,体现了中国外交中的和平观念、革命观念、发展观念与和谐观念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辩护功能。

总的来说,建国后中国外交观念的演进历程,反映了中国外交观念与国家利益之间由相互吻合到不相吻合再到相互吻合的曲折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体现了党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和两极格局条件下领导国家对外交往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世界多极化条件下领导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此演进历程进行理论探讨和研究,必将使我们在当代中国外交观念革新与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问题上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注释:

①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以其特有方式构成的知识和

社会实践,它不再被看作是文献(书、书本、文本、叙述等),而被看作是档案或纪念物。不同话语以不同方式构成主要社会存在,并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相互结合产生新的、具有复杂含义的话语。参见 [英] 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 话语与社会变迁[M]. 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郑华. 话语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福柯的“话语观”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J]. 现代国际关系, 2005,(4)。

参考文献:

- [1] 胡文. 当代高级英语词典[K].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 [2] 金正昆. 现代外交学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谢益显. 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1979)[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5] 周恩来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 [6] 章百家. 中国外交成长历程中的观念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 [J]. 外交评论, 2009,(3).
- [7] 张历历. 当代中国外交简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8] 石志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89)[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9] 王逸舟. 中国对外关系转型 30 年(1978—2008)[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0] 郭树勇. 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6.
- [11] 邓小平文选(3)[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2] 梁守德, 洪银娴. 国际政治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3] 谢益显. 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79—1994)[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EB/OL].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22/content\_3954937.htm
- [15] 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N]. 人民日报, 2008-01-24.
- [16] 吴学琴. 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流行语的变迁[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3).
- [17] 侯惠勤. 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1).

责任编辑: 简 明